

## 夜讀章詒和

● 張 均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以下簡稱《往事》，引用只註頁碼）因涉及「反右」、「文革」等敏感問題，近年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廣有反響。此類題材雖不稀見，但作者以其特殊身份（民盟領袖章伯鈞之女）、特殊交往和凝煉婉致的才情，贏得眾多讀者。筆者對此書所載儲安平、聶紺弩兩先生的獨立氣概和張伯駒先生的散淡情懷，深懷敬重。但整體而言，筆者不太認同此書。

《往事》意在為一群身處特殊年代的大知識份子繪製「聖像」，即「用血淚之迹，雕刻遠逝的靈魂」（封底，孫郁語）。當然，作者聲明無意畫「聖像」，而僅希望使他們免於「遭受藐視」，但今日自由主義者正冉冉升上神壇，談之論之、與之謬託知己都已成時尚，何「藐視」之有？當然作者也寫了不少知識份子的「缺點」，但皆「小事」，「〔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頁270，羅隆基語），關鍵是在大原則上她如何為他們畫像。此書有三大原則：反專制之自由精神；與革命扞格不入的舊式美德與情感；貴族紳士式文化風度。依此三點，作者虔敬地繪製了一組親切動人的「聖像」。

讀罷此書後，筆者深感內容自相矛盾，許多細節意外地溢出了作者的約束和控制。作者一心塑造「聖像」，橫溢的細節偏偏顯示了其「真精神」，見證了「聖像」的倒塌。筆者未讀此書時對之有不少景仰，讀後感動仍存，但多了些失望與倦意，以及對作者和我們共同置身於其中的某種話語方法產生懷疑。

作者在此書中指出，知識份子最重要的特質在於反專制、求真理的自由精神，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寶貴的。」（頁30）凸顯自由精神，是此書最打動人心的部

作者依照三大原則：反專制之自由精神、與革命扞格不入的舊式美德與情感、貴族紳士式文化風度，繪製了一組親切動人的「聖像」，但筆者深感此書內容自相矛盾。

此書從反面表明，自由、民主等理念，在現代知識份子群體中並未成為信仰基準，而更多是一種可運用、可轉換或可拋棄的知識系統，一種文化資本。在中國，從自由到專制往往只隔一個門檻。

分。如寫報人儲安平，「他用死維持着一種精神於不墜，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筆者很感動於作者對儲臨終狀態缺乏實據的抒情，也認可她的評價，「魯迅認為：『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儲安平「屬於『真的知識階級』。」（頁77）這類知識份子和其他優秀人物一樣，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但讀罷全書，筆者是失望的，因為儲的獨立「氣節」僅有個案意義，可詩化卻不能代替對知識份子群體的整體認知。

正如窮人並不是天然就具有道德優勢一樣，複雜的知識份子群體亦非天然地就是反體制的鬥士，譬如羅隆基和史良。作者將羅隆基描寫為一個有些個性缺點的民主信徒，但考以羅之處世行事，則其「缺點」恐非止性格，而與其思想承傳、人生信仰有莫大關係。羅非常迷戀權力，講究等級，總愛和別人比級別、比待遇，碰到級別高的就不服氣。比如他找體育館要票不如意，就大發脾氣，「為甚麼黨員部長可以坐主席台，而我這個四級部長卻不能？」（頁289）

羅隆基對級別低的人則明確劃出等級。一次入川視察，他大擺官譜，堅持單獨坐一輛小轎車，拒絕別人與他共乘。這些確是「小事」，但卻可以小見大。在這一點上，章伯鈞比作者看得更透切，「也難怪努生把坐車的事看得那麼重，因為在缺車少油的中國，坐小汽車是個權力和地位的標誌。」（頁294）羅如此重視權力，並習慣於從權力中感受人生價值，應是傳統專制思想、權力崇拜在作祟，與他師從的拉斯基民主思想無太大關係。史良的權力慾同樣不弱。1963年民盟主席沈鈞

儒病逝，史良自恃「反右」有功理當接任，誰知花落別家，「據說，自那以後史良的身體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學習，她常請假。」（頁20）

羅、史皆是熟諳英美自由主義法學的知識份子，但仍有強烈的與民主理念很不相符的體制迷思。這不免讓人對所謂「中國自由民主派知識份子」產生根本懷疑。筆者曾與作家韓少功先生做過一次訪談，偶及此書。韓先生稱：「現在反專制的人，不是在原則上修改專制，只是因為在遊戲中我出局，我非常憤怒。憤怒情有可原，非常值得理解和同情。但是他那種批判不是規則的批判，而是分配結果的批判。不是修改規則，因為他們表現出來的地方有些也是那種規則。」羅、史未必不如是。他們不滿專制政治，並非專制規則本身悖離自由，而是專制的權力分配於己「不公」，自己被棄諸「野」。在此書中，無論是民盟內部的章羅鬥爭，還是所謂「章羅聯盟」的垮台，牽動歷史軸心的，主要不是關於自由、民主概念的理論分歧，而是人事鬥爭和權力角逐。知識份子們計較的，主要還是利害得失。

此書從反面表明，自由、民主等理念，在現代知識份子群體中並未成為信仰基準，而更多是一種可運用、可轉換或可拋棄的知識系統，一種文化資本。如此作論並非苛求羅、史等前人，因為在今天，以知識、思想作為博弈資本的現象亦非常普遍。這類知識份子，即使有幸當政，大概也很難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為盤坐於其內心的權力崇拜本身即是對民主的威脅。在中國，從自由到專制往往只隔一個門檻。此類教訓實不少見。所以，

作者動輒將知識份子視作自由之代表的做法，實在有待商榷。現代中國的大多數知識份子，即使在權力角逐中失利，遭受不公待遇，也並不天然地就是「真正的知識階級」。

作者不假思索地把「自由」當作知識份子天然的標籤，但恰是她自己拆解了這一神話。《往事》回憶了大量知識份子的「有德」「有情」之事，如朋友間的君子之交和親人間的相濡以沫，不少地方甚是感人。如史良在丈夫不在的場合拒絕與男人合影，以其「有容、有執和有敬」的大家閨秀風範贏得蘇聯專家的極大尊敬。又如張伯駒老夫婦艱難步行看望被冷落的章家母女，僅為看一眼，「放心」（頁143）。當然，作者也如實回憶了不少反目和背叛事件，如史良對章伯鈞的「反戈一擊」、蒲熙修對有着「十年親密的朋友關係」的羅隆基發難。但這些事件均被特定的話語彌合了，因為此類不堪之事皆係專制高壓之結果，背叛者痛苦無奈，事後也得到諒解。這表明，舊式美德與情感在此不但得到了最好保存，甚至歷經劫難、煥發生機。

我們不能說這些不是事實，但另一些細節卻不能不動搖筆者的嚮往與敬重之情。比如被作者讚不絕口的史良的婚姻，就多少讓人對這對夫婦的品行產生懷疑。作者看到，小陸對史良「照料之周，體貼之細，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頁8），還「無比忠誠」，模範至極，但稍作深究便不難看出作者觀察的浮淺。其實小陸很可能根本不愛史良。小陸「年輕英俊」而史良年老貌醜（據照片），小陸在國外讀書時「和一個漂亮姑娘關係密切」以致不願回國見

史良，但史良有名、有錢、有勢，小陸出身低微，出國、讀書、工作全是史良通過朋友（宋慶齡、周恩來）一手包辦，史良一怒小陸前途就會化為泡影。所以，這段婚姻是一樁交易還是兩情相許，大可懷疑。至於小陸後來對史良「比保姆還保姆」，「在史良成為部長後，他一門心思都撲在妻子的身上。人前人後，常常是『史部長』、『史部長』地叫着」（頁8），是否夾雜着被迫、無奈乃至虛偽呢？而史良的大家風範，也可能僅是在公眾場合的刻意表演。所以，讀至書中寫晚年史良揮動白手帕「以憂傷表達出的至愛」（頁23），不免令人生疑，難以感動。

較之史良，康同璧更被視為老派美德稀有的見證。但就是這位知書識禮的老人，為人極端自私。為讓女兒長期照顧自己，竟「不願意女兒和男人來往」，一次媒人上門「沒幾分鐘」就被「攆出了大門」（頁195-96），這種變態心理與《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又有多少不同呢？

史、康對親人尚且如此虛偽、自私，對朋友又能真誠到哪裏去呢？這不免叫人懷疑：作者傾心不已的「有德」、「有情」之事恐怕大半是霧裏看花的結果。其實就書中所見，這些知識份子待人接物都重在「禮數」，而乏知心之誼，表面上醇味悠長，實則疏遠，各自隔着一堵高牆，很少彼此交流；既不願將內心示之於人，亦缺乏理解他人的興趣與能力。即以作者而論，她交往過很多知識份子，但對他們的身世、情感和遭遇的了解實在泛泛。書中的動情描寫，多半是寫書之時揣測而成，人物內心是否真如彼，未必經得起推敲。

史、康對親人尚且如此虛偽、自私，對朋友又能真誠到哪裏去呢？作者傾心不已的「有德」、「有情」之事恐怕大半是霧裏看花的結果。就書中所見，這些知識份子待人接物都重在「禮數」，而乏知心之誼。

作者對貴族紳士式文化風度非常留戀，反覆稱之為「審美化」的優雅生活方式。但此類回憶除能激起部分中產階級的嚮往外，並不能讓人對所謂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增加絲毫敬意。

至於貴族紳士式的文化風度，作者最為津津樂道。但她講得愈多關於張伯駒夫婦、康同璧母女的事情，就愈與知識份子精神南轅北轍。在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可貴素質在於對正義與良知的承擔，對自由、平等理念的不懈探索及實踐。而書中的貴族風度是甚麼呢？一是品茶論詩（舊詩），一是生活之考究，如一條毛巾頂多用兩週、經常去名店吃西餐（奇怪的是章家結識的知識份子無一例外熱愛西餐，在自己參與過的無數次餐宴中，作者也只願把吃西餐的情調拿出來一次次地寫）。當然，在店裏吃西餐還未見品味，康家招待客人的西餐才叫上等氣派，吃一次西餐要換兩百隻盤子！康家連裝豆腐乳的盒子都很講究，盒子要六隻，分別裝致和豆腐乳、廣東腐乳、紹興腐乳、玫瑰腐乳、蝦子腐乳，等等，每種腐乳要二十塊，每二十塊放在一個盒子裏，絕不可混……作者對此非常留戀，反覆稱之為「審美化」的優雅生活方式。但此類回憶除能激起部分中產階級的嚮往外，並不能讓人對所謂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增加絲毫敬意。在那樣的年代，有誰願意相信一個熱衷如此品味的人會是真正社會良心的代表！

反抗專制、舊派美德、紳士風度，是作者用以繪製知識份子「聖像」的三件法寶。然而，此書呈現的知識份子的駁雜性又推倒了「聖像」。但何以作者不能意識到這一點？這在於她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迷思。作者理論水平有限，但她對知識界流行的自由主義敘述方法大體是掌握的。自由主義之核心在於自由概念，而自由概念因社會階層生存狀

態的不同而呈現為不同的內涵，如底層群體將它理解為「免於匱乏的自由」，知識群體則理解為「思想的自由」，故談論自由需考慮具體語境與各利益群體間的「對話」現實。但中國自由主義者從知識階層的片面立場出發，將自由界定為「思想的自由」，為爭取思想自由而反專制、反體制。《往事》形散而神不散，「神」就在於反專制的意識形態迷思。全書有句點睛的話：「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頁185，康同璧語），這種完全經不起推敲的話，與反體制敘述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凡受體制壓制的人就是好人，凡壓制好人的體制就是應該被憎恨的。這種反體制敘述被作者灌裝到所有「片斷往事」之上，在儲安平、聶紺弩身上確可見到自由的光芒，在史良、羅隆基身上則似是而非，在康同璧母女身上就不倫不類了。

而且，作者對於反體制的認識實在是知表而不及裏，事隔半個世紀，並未比她當年的「羅伯伯」（羅隆基）前進半步：即只反對與己有害的體制，而對與己有利的體制卻嚮往有之，這往往不被人注意。比如，作者一邊激憤地批判極「左」體制，一邊卻又饒有興致地提到一位「林女士」。作者雖見過她多次，知道她算卦奇準，但因為她實際上只是依賴康家生活的女傭，身份很低，故作者對她的名字、身世全無了解或記述的興趣，但對她的「謙恭」順從，卻興致勃勃，反覆渲染；對她為康家守護遺物的耿耿忠心大加描繪。欣賞之情，溢於言詞。這不就是舊戲曲裏常見的「義僕」形象嗎？在貴族體制下，「義僕」是貴族對窮人一廂情願的設想：人的命，

天注定，窮人要做好僕人本份（「職業倫理」），貴賤有份，不要妄生非分之想。對林女士的不自覺欣賞，表明作者對體制的反思僅止於詛咒體制給自己所屬階層帶來的傷害，而非對體制本身的挑戰與反省。

說到底，《往事》缺乏真正的歷史反思。實質上，它是魯迅批評的那種以計較個人利害為原動力的控

訴式表達。作者對知識份子「聖像」的塑造以及她所依附的自由主義反體制策略，皆需深刻反省。迄今為止，中國並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百年來西方的自由精義，不過如一顆被風吹起的種子，並未在中國權力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中國知識份子若欲成為「真正的知識階級」，恐怕還有漫長道路。

## 現代知識份子的出與處

### ● 夏兆輝



耿傳明：《周作人的最後22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周作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巨石重鎮」（鄭振鐸語），同時又是一個複雜而具有爭議性的人物。他擁有雙重身份，既是叛徒

又是隱士，既是文人又是「督辦」。正是由於周作人身份和思想的複雜性，他才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界和思想界一個富有活力的話題。關於周作人的傳記已有多種，如錢理群的《周作人傳》、倪墨炎的《中國的叛徒與隱士——周作人》、李景彬等的《周作人評傳》、雷啟立的《苦境故事——周作人傳》等，但耿傳明的《周作人的最後22年》（以下引用只註頁碼）有其獨特的學術價值。

從時間來看，作者敘述了周作人生命中最後二十二年（從1945年日本投降到1967年去世）的心路歷程；從手法來看，作者採用「以史傳人」的方法，把傳主放在更大的社會網絡中進行考察，透過時代去觀察人，通過人來反映時代的變遷；從內容來看，除了運用大量的史料來為時代作注解之外，作者還把周作人放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轉型中來審視現代知識份子的思想文化心態，分析他自身的文化性格對後來

周作人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人物。作者把他放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轉型中來審視現代知識份子的思想文化心態，分析他的文化性格對後來「附逆」的影響，並通過解讀其舊體詩中的佛典來探析他的心態。